



战国坐人铜灯

形态各异的古代“人形灯”

□曲水

中国人素来将灯火明艳的场景视为吉兆。灯火不仅是一份光明，还是温暖和希望的象征。北周诗人庾信曾作《对烛赋》云：“刺取灯花持桂烛，还却灯檠下烛盘”。

最初的灯其实就是火炬，但真正意义上的灯盏得具备盛燃料的盘盏和可供燃烧的灯芯这两样装置，考究点的还有“檠”。所谓“高灯下亮”，为扩大光照范围，人们往往将灯盏高高支起，用来支灯的柄柱便是“檠”。严格来说，夏商周三代时是没有灯的，那时的人都按自然规律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灯具也没关系。但到了春秋战国乃至两汉，各式各样的灯具纷纷出现。其中就有一种叫人形灯，也有人称其为“力士灯”。《公羊传》称“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力士即勇士。春秋战国时还有以“力士”为名的职务，专司金鼓旗旌，乃随侍君王的近臣。

如今存世的人形灯中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站立姿态的人形灯。如战国中晚期的银首人形灯。战国是个尚武的时代，勇士大都刚烈莽撞，“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就

源于当时的齐国。这银首人形灯于上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三汲出土，首部用银制成，两目是黑宝石，人物身着直裾深衣，衣服由红黑两色填漆而成，衣服上还饰有卷云纹。人的右手握有一条螭（无角之龙）。螭口衔柱，柱顶为灯盘。左手持螭尾，螭翘首承起另一灯盘，其下部分卧在兼为底座的最大灯盘之中。擎灯者立于方座之上，发髻工整细致，发顶盖有包发的方巾。该灯的造型自然优美，且富神话意味。我们今日观赏，还能从中依稀推想出古代先民的社会习俗及其古风朴朴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眼光。

人形灯也有呈坐态的。但古人的“坐”和我们今天的“坐”不是一个概念。古人的“坐”指双膝曲而接地，臀部顺势贴坐在两足跟上。1974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战国坐人铜灯”呈现的就是这种标准的古代坐姿。此灯由坐人、灯柄和灯盘三部分组成：坐人偏髻、束冠、长袍，两臂平伸，手握丫字形灯柄，柄上托一环形灯盘。除有跪坐姿态的人形灯外，还有一种人物盘腿而坐的人形灯。如和合二仙造型的古灯就是典型代表。明代画家徐文长（徐渭）曾绘有《寒山拾得图》，画的是寒山、拾得两位高僧交

谊的意趣。清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封寒山、拾得二僧为和圣、合圣。从此后，和合二仙便成为了和合美满的象征，工匠们经常以此作为工艺美术创作的题材。和合二仙灯中，寒山、拾得两僧神情肃穆，盘腿端坐托盘正中，其中一人捧盒，一人持莲，头上则顶有灯盏，既富吉祥寓意，又有民俗气息。

东汉时期还出现过另一种人形灯——青铜制人形吊灯。该种吊灯的造型就今天的人看来依然非常奇特。此灯由灯盘、贮油箱和悬链三个部分组成，贮油箱即是人形。它以一个双手捧圆形直腹平底铜盘的横卧成年男性为主体，在人的双肩和尾骨上各有一个环扣与铜悬链相连接。此设计可说是充分利用了物理学中的三点平衡的原理。这盏铜灯既可以任意悬挂在横梁或钩钉上，也能由人用手提着。可见古代工匠是在全面考虑了使用效果后才进行创作的。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起到贮油作用的“人”并非汉人相貌，而是卷发、深目、高鼻，一看就知乃当时的蛮夷人种。将其设计成奴仆或俘虏，并做出屈从服务的姿势，真实体现了当时汉人权贵的骄傲心态和一种征服的欲望。

投稿邮箱：sat@cnnb.com.cn

百姓收藏故事

□记者 李菁/文 龚国荣/摄

印章是一门古老的篆刻艺术。它集绘画、书法、金石篆刻、雕刻等多种艺术样式为一体，似乎每一枚收藏级印章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在宁波，有不少喜欢收藏印章的藏友，年逾七旬的周康信老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平时喜欢收藏钱币、金石篆刻杂件的他几年前收藏到了一枚明代名家吴迥篆刻的寿山石印章。平时有空，或有藏友到访他总会自豪地拿出来一起鉴赏、研究，也更加体会到了中国印章文化的源远流长。

明代吴迥篆刻印章



一枚难得的明代寿山石印章

一枚貌似普通的私人印章

中国的印章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大体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类。官印，乃官方所用之印章。历代官印，各有制度，不仅名称不同，形状、大小、印文、钮式也有差异。官印一般比私印大，严谨稳重，多方形，有鼻钮。私印则是身份的证明和对某物品的拥有，如在属于自己的书籍或画上盖上印章等。至于制作印章的材料，除了金、银、铜等金属外，还有骨角质、木质、琥珀和石质等。寿山石因“温润光泽，易于奏刀”的特性，而成为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

周先生获得这枚印章纯属偶然。2006年4月，他去逛慈溪周巷古玩市场，发现了一枚貌不惊人的寿山石印章，当时觉得其外形朴拙大方，便买来收藏。因为对它的来历和年代并不明了，所以周先生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文献，谁知道，对它的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它的不简单。

这枚印面约3.5厘米见方、高约7厘米的寿山石印章，为私人名字章，石质色如蛋黄，内有红筋，边角有些许残缺，印文为“谈嘉涓印”，边款刻：“紫淮老年翁弟携时乙巳年春日吴迥”。

中国印章三千年，其间有两座高峰，一是秦汉古玺印，二是明清流派印。明代中后期，文彭、何震等文人书画家，自篆自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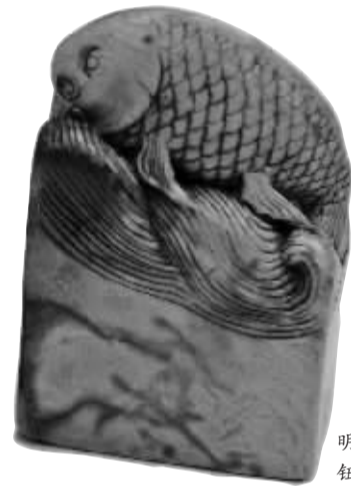
寄托情怀，拉开了流派篆刻的序幕。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时期，印家辈出，流派纷呈，尤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和以邓石如为代表的“皖派”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

据周先生介绍，此枚印章虽为私印，且“谈嘉涓”所谓何人已无从考证，但印章的篆刻者吴迥却是与明代流派印名家何震同时代的印家名人，属名家篆刻印章，因此弥足珍贵。

根据印章的边款所示，该章刻自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正是吴迥生活的年代。吴迥，字亦步，今安徽人士。清代书法、篆刻家叶铭在其所著《广印人传》中提到：“董其昌书其（指吴迥）谱曰：‘亦步舞象时气已吞虎，今犹二十许人，试以其印章杂之长脚（何震）印中，不复可辨，不知异时复作何状。’有晚采居印谱。”是说吴迥的风格与何震相似，深得其法，到了难辨真假的地步，为董其昌（明代书画家）所推重。该印章的印文用笔猛犸挺拔，苍浑厚劲，疏密均匀，堪称大家风范。

藏石藏印 各有门道

印章的收藏自古有之，而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印章的收藏更是形成一种热潮，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藏家辈出，其中就有丁辅之、张鲁庵、华筌安、高络园、葛书徵等印章收藏大家，以及近代钱君匋等人。近年，随着印章拍卖的兴起，名家篆刻、印章逐渐为藏



明代鱼形钮印章

家所关注，市场行情也在不断攀升。

据介绍，印章的收藏一直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伸展。一是藏印，即鉴赏印章篆刻的金石美、边款诗文的沧桑美、闲情趣语的印文美。另一种玩法是藏石，即鉴赏印章石料的灵透和印钮的雕琢天成。

周先生收藏了许多不同材质和不同印钮的印章，材质有青田石、玉、鸡血石、水晶，也有青铜、竹子、瓷器、木根制成的印章，他向记者展示了两枚所珍藏的有独特印钮的印章，一枚是明代鱼形钮印章，用寿山石雕刻而成，再加以特殊烧制工艺，形成了独特的外貌风格。另一枚是宋代龟形钮印章，非常小巧，印面只有2厘米见方，高1.8厘米。两枚印章的印钮都雕刻精致，线条简洁，动物的灵气和动感扑面而来。

据悉，印钮的设计最初以实用为主。商周时期有了玺印，人们为了随身携带方便，便在印章的顶部设置了一个可穿通的钮，可以将印章穿起来佩带。后来逐渐成了印章的装饰品。龟钮商周时就有，汉二千石以上官秩用银印龟钮。龟表示吉祥长寿，古人很看重它，把它和青龙、白虎、朱雀合称为“四灵”。



68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

我说：“让他们闹吧，灾难是我的宿命。”

“也是我的宿命。”妻子说。

过了几个月，忘了从哪里回到上海，已经有一位广西来的年轻学者在等着我。这位学者个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历史资料里描写的李白。他叫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曾经花力气研究过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论文。现在，连我的远行考察和回来之后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内容。他这次来，说有一些重要想法要与我谈谈。

正准备与他长谈，又接到一个让我高兴的电话，那是齐华打来的。自从那次见面后，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从了我对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推荐，努力钻研，写出了一些论文，已经从人事局调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他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经常去请教前辈余鸿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鸿文先生和我的关系，所以要见个面，另外说点别的事。

我想，既然凑到了一起，就把齐华和杨长勋拉在一起聊天吧。齐华比我大六岁，而杨长勋则属于下一代，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视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较有趣。

这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过熟人找了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安排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茶水。三个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泻的雨柱，开始畅谈。

根据长幼有序的礼节，我请齐华先说。齐华有一点老了，却显得比以前经看，很有风度。

齐华告诉我，余鸿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儿、女婿家，远在长江边的宝山路浦镇，来往很不方便。我请他先代我问好，很快我会陪着父母去拜访。

说完余鸿文先生，齐华停了停，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为一个叫王北珍的女画家写过序言？”

“写过。”我说，却又奇怪地问，“你怎么问这个？”齐华没回答我，继续问：“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当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我说。

“你是1989年之后写这篇序言的吧？”齐华又问。

“是啊。”我说。

“这篇序言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过吗？”齐华还在问。

“发表过。”我说。

“报纸怎么会同意发表？”他问。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我说。

“听说你写序言的画册上，有他们父女俩的合影？”

“对。”

“发表后，那个姓王的流亡人士说过什么？”齐华问。

“他叫他的女儿感谢我。”我说。

“可见告发的内容完全属实。”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告发？绘画就是绘画，我欣赏她的色彩运用，这与政治没有关系。”我说。

“真有一个叫曾远风的人告发你了。”齐华放轻声音说，“把这些材料复印后到处寄，寄给各家报纸的领导，连我工作过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显而易见，你看，全国那么多报刊，那么密集地发表攻击你的文章，为什么得不到丝毫阻止？”

我还是摇头，说：“这是你的推测，现在已经不是告发的时代，不会有用了。报刊发表那些文章，只是为了发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

立即响起响亮的笑声，是杨长勋。我没想到，他的嗓音那么好听。他对着我说：“你说告发信不会有用了，我相信；你说那些文章不密集，谦虚了！”

他又转向齐华说：“余先生的谦虚，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读报纸不上网，连个手机也没有，害得我们代他受了好几年气！”

我连忙解释：“其实也有人说起，但我不想听。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奔。”

“但是，除了你和他们，还有第三者，那就是广大读者。读者分不清假话脏话，也会把你看脏了。”这是齐华在说。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